

我国环境行为研究述评

彭远春

〔摘要〕 环境行为是环境社会学的研究重点之一。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环境行为研究现状，侧重从政策取向视角、环境态度—环境行为关系视角、社会结构视角等对国内环境行为相关研究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研究发现，既有研究普遍流于现状描述，较为缺乏理论关怀与理论解释，尤为忽视环境行为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及其生成机制。进而提出应超越环境态度研究的范畴，将心理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加以结合，直接对环境行为开展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

〔关键词〕 环境行为；环境意识；环境态度；结构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 C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 (2011) 01-0104-06

与西方学界多学科、较深入地研究环境行为^①相对，我国学者最初对环境行为缺乏关注，研究成果较少，且大多包含在政府部门以及部分学者开展的环境意识调查及相关论述当中，流于描述且较为空泛。直到2000年以后，中国环境社会学进入快速成长时期，公众环境意识与环保行为亦成为明显的研究重点^②，相关成果才较大幅度增加。表1较好地反映了这一点，1990年以前学界对环境行为缺乏直接探讨，20世纪90年代仅有5篇文章直接论述环境行为，而2000年以后增速较快，2005年以来增至40篇。并且最初主要探讨企业环境行为，2000年以后才较多关注中

小学生、大学生以及公众的环境行为。

表1 不同时期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研究概况^②

单位：篇

	1980-1989年	1990-1999年	2000-2004年	2005年至今	合计
环境意识	5	125	126	171	427
环境行为	0	5	11	40	56
合计	5	130	137	211	483

总体而言，我国环境行为研究相当薄弱。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表1只是较为直观地反映出

① 到目前为止尚无明确一致的界定，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称呼，如环境行为、亲环境行为、负责任的环境行为、具有意义的环境行为、环境友好行为、环境保护行为、生态行为等。而国内使用较多的是环境行为与环境保护行为。上述名称虽有着细微的区别，但内涵基本一致，强调日常生活的行为结果对改善环境状况与提升环境质量的正向作用。本文亦是在这一意义上理解和使用“环境行为”这一概念。

② 2010年9月下旬登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在跨库高级检索中分别输入篇名“环境行为”或“环保行为”或“环境保护行为”、“环境意识”或“环境态度”或“环境关心”，按照精确查询格式在相应的时间范围内查询。设定检索的期刊范围包括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博士学位论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4个数据库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再根据文章标题判断，相应排除与环境行为明显无关的文献。

〔作者简介〕 彭远春，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社会学所研究人员，博士，北京 100872。

我国环境行为研究的大致情形，对环境行为进行间接探讨与论述的研究并未包括在内。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环境行为研究现状，以及为未来研究指引方向，本研究着重从政策取向视角、环境态度—环境行为关系视角、社会结构视角等对环境行为有关的研究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

一、政策取向视角

在国外早期的研究中，一般将环境行为视为环境意识或环境态度的重要维度，而环境意识作为舶来品，正好与我国盛行的知行合一观念相契合，故将环境行为视为环境意识的重要方面也就再自然不过了。^[2]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环境理论工作者和环境管理工作普遍认为是，环境意识至少包括环境法律意识、环境道德意识、环境科学意识和环境参与意识等四个方面，环境意识的高低，往往通过环境态度、环境行为、环境知识来体现。^[3]加之认为公众环境意识对解决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是有效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基础，故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开展了一系列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旨在了解其环境意识现状，以更好地促进环境宣传与环境保护工作。最具代表性的是全民环境意识调查（1995 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1998 年）以及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调查（2005 年以来）。

“全民环境意识调查”基于“环境意识是指人们在认知环境状况和了解环保规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而发生的参与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它最终体现为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上”^[4]的理解，将其分解成“环境知识”、“基本价值观念”、“环境保护态度”、“环境保护行为”四个方面，并进行相应的操作化，环境行为被赋予最高的权重。调查结果发现：我国公众环境意识水平偏低，且隐含着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与保护环境、个人环保意识觉醒与群体环保意识薄弱、个人投入与国家投入、主张依法保护环境与法律知识缺乏等四对矛盾，进而导致人们行为与意识在某种程度的脱节，以至从日常社会生活中看，城乡居民实际表现出来的行为，对于环境保护来说，往往是消极的、被动的。^[5]

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旨在全面、准确地描述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现状，探讨影响公众环保意识的相关因素以及进一步加强公众环保意识，推动公众自觉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科学途径。调查结果发现，公众的环境意识明显呈“政府依赖型”，环境意识、环境知识的总水平不高，公众的环境道德较弱，参与环保活动的总体水平较低。

文化程度是影响人们环境意识与环保知识的最关键因素，而环境知识水平、文化程度、对当地环境状况的感受、遇到环境问题如何解决以及城乡差异依次对环保行为有着从大到小的影响。^[6]

2005 年度的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调查则将公众环保指数分解为环境意识、环保行为以及环境反思三个大的方面，分别由环境认知与环境知识掌握度、个人与私密、社区、公共空间的环保行为、环境问题处理与环境创新水平等指标组成。^[7]2006 年度的调查对上年度的指标体系进行了调整，确定“环保民生指数”由环保意识、环保行为、环保满意度三个一级指标构成。2007 年在坚持将“环保民生指数”分解为环保意识、环保行为、环保满意度三个方面的基础上，将其相应分为环保知识与环保态度、环境宣传行为与环境参与行为、对环境的满意度与对环保行为满意度等二级指标。^[8]2008 年在环保意识、环保行为、环保满意度 3 个一级指标保持不变的框架下，调整了指标体系，更注重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依据年度热点和重大环境问题更新了调查内容。^[9]虽然上述年份的指标体系与问卷内容有着一定的调整，但研究发现存在一致性：公众的环保意识总体水平不高，环境参与度较低，环境满意度令人担忧；环境意识与环境满意度影响着环境行为，且环保意识对于环保行为的影响表现得更为明显。

由此可见，环境行为的政策取向研究视角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环境管理者和研究者对环境行为的研究经历了“忽视环境行为——将环境行为涵括在环境意识之中——将环境行为从环境意识中剥离出来，单独探讨环境行为”的历程。政府和社会各界最初侧重关注工业污染，寻求采用科学技术手段、加强环境监控与管理等举措去治理环境，而影响相对隐蔽的生活污染常被忽略，与之密切相连的环境行为在较长时间内亦被排除在关注范围之外；随后在政策探讨与学术研究中，直接移植了西方的环境意识，由于西方环境意识概念内涵丰富，包括认知、情感、意向以及行为维度在内，故我国环境意识概念外延与内涵亦较为宽泛与模糊，涵括环境认知、环境情感、环境行为意向以及环境行为等在内，进而环境意识研究难以达成共识，阻碍了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深入探讨。直到 2000 年左右，环境管理者和研究者才认识到，环境意识的提升最终落脚点在于环境行为的改进，将环境行为逐渐从环境意识中剥离出来，

作为独立变项单独加以探讨。

第二，政策取向研究重在描述公众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对其背后根源与生成机制缺乏深入探讨。环境管理部门推崇通过环境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拓宽公众环境知识面，增强其信息获取能力，从而提升公众环境意识，推动公众自觉参与环境保护活动，最终促进环境治理与改善环境质量。由此组织实施了一系列调查，关注点自然落在公众对环境状况的认知、环境知识水平、环境信息获取方式、对环境管理工作的评价等，对社会制度、文化观念等结构性因素缺乏关注。与此同时，虽然对环境意识、环境行为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职业、地域等社会人口特征的相关关系加以考察，但旨在识别不同人群在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方面的差异，以采取因应之策。此外，由于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界定不一致，具体指标多种多样，加之无论是调查内容还是调查本身，稳定性与连续性较弱，从而不利于研究成果间的对话与交流。

二、环境态度—环境行为关系视角

与国外早期研究类似，我国环境教育学与环境心理学研究者往往认为环境态度决定环境行为以及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行为之间有着递进关系，即通过环境教育与环境宣传活动的开展，以提升学生或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促使其形成适当的环境态度，进而产生有利于环境的行为。基于这一认识，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环境教育学与环境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议题。

王民根据中小学生的特点，将其环境意识分解为环境知识、环境态度、对环境的观察与评价、环境预期行为、对环境教育及活动的参与态度 and 程度五个方面，并着重探究彼此间的关系。^[10]研究发现：环境态度是环境意识整体中的关键连结要素；对小学生而言，增加环境知识，就可以形成环境态度，并影响到环境教育的参与程度，进而产生预期的环境行为，即小学生较为符合“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行为”模式；中学生的环境知识与其预期行为关系不大，而对环境教育的参与态度与环境预期行为密切相关，即中学生较为符合“环境态度—环境行为”模式。

钟毅平等研究表明：大学生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相互影响，二者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正向相关，即环境意识越强，环境行为越积极，而环境行为越积极，则可以进一步强化原有的环境意识。^[11]沈立军对山西五所大学的 816 名学生的调查发现：环境价值观（NEP）对环境行为产生

直接影响，也通过环境态度对环境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即环境态度直接影响环境行为的同时，亦在环境价值观与环境行为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12]

孙岩通过选取大连市企业职工作为城市居民代表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实施环境行为的总体水平较低，多停留在浅层次上；环境知识和生活经验变量（社会参与、自然接触、信息接受、角色影响）直接影响环境行为的同时，还通过环境态度（NEP与环境敏感度）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环境行为；相对环境知识与生活经验变量而言，环境态度以及控制观、环境责任感等个性变量对环境行为的直接作用较小；环境价值观与环境态度并不相关，而与环境行为直接相关，即“环境价值观—环境态度—环境行为”这一假说并未得到验证；情境因素直接影响环境行为的同时，对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二者间关系起着调节作用。^[13]

刘建国对兰州市 200 位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显示：不能简单地认为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呈现相关或不相关关系，应更为具体地探讨不同类型的环境意识与不同类型的环境行为之间是否相关以及怎样相关。^[14]唐明皓等对长沙、株洲、湘潭 3 个地区 578 位城镇居民的调查发现，环境态度及其各维度（环境知识、环境价值观、环境行为意向）与环境行为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15]祁秋寅等以九寨沟为案例地，探究了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倾向的关系：游客的环境情感、环境知识对其环境行为有着显著、正向的影响；游客的环境道德观对环境行为倾向影响较小，说明其对游客环境行为只具一定的约束力；游客的环境责任态度与行为倾向没有显著关系。^[16]

概而言之，从环境态度—环境行为关系视角对环境行为进行的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对环境意识、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理解与界定不统一，如将环境意识看作是一个综合体，由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评价、环境预期行为与环境参与等构成，或将环境意识等同于环境认知或环境态度等；而在环境态度的区分上也存在不一致，如等同于新环境范式，或由环境信念与环境敏感度构成，或分解为环境知识、环境价值观、环境行为意向等；而环境行为又有着一般环境行为与具体环境行为、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直接环境行为与间接环境行为等区分。概念模糊不清、界定不一以及彼此交织，使得研究本身具有较大局限，由此增加了彼此交流与相互

借鉴的难度，从而在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关系的探讨上难以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以及取得较大的进展。

现有研究多局限于某一城市或某一地区，另外在样本大小的确定、对象的选取等方面也存在诸多不足，从而影响调查发现与相关的研究结果；其次，大多数研究对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间的关系只是基于统计意义上的发现并加以描绘，缺乏理论关怀与理论解释，较易陷入数据流与统计谬误；此外，侧重关注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价值观等心理性变量，忽视了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制度、文化规范等结构性影响因素。

三、社会结构视角

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其行为嵌入社会体系与社会结构当中，即社会经济地位、物质生活条件、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等对社会行为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环境行为亦具有鲜明的社会性，故部分学者从文化传统、社会规范、社会制度与环境政策实施等方面对环境行为加以直接或间接的探讨。

(一) 文化因素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强调民间环境知识、文化传统、社区规范、价值观念变迁对环境行为的影响。

早在 1993 年，麻国庆就提出应将环境研究置于社会整体中予以把握，重视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并以游牧民、山地民、农耕民为例，揭示了不同文化群体所拥有的民间环境知识对其生存、发展以及社区环境管理的作用。^[17]马戎则进一步强调传统文化信仰、传统生产与生活习俗、社区规范、生产与生活方式、自然资源观念变化对环境以及环境行为的影响。^[18]另有学者指出宗族身份认同、生育文化、民间信仰、风水观念等地方性文化对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有着相应的影响与塑造作用。^[19]

而传统生态规范与社区伦理的衰退，加之基于污染事实之“新”环境价值观的型塑，削弱甚至瓦解了原有环境友好行为，进而催生与固化了环境破坏行为。如陈阿江着重对水污染展开研究，认为农业社会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村落社会规范以及村民道德意识有效约束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使得传统社会水域得以保持清洁，而社区传统伦理规范的丧失等则是 1990 年代以来水污染加剧的主要原因。^[20]面对太湖流域水污染愈演愈烈的局面，他进一步揭示了从外源污染转向内生污染的社会文化逻辑：外源污染持续污染水体的同时，逐渐摧毁了村民传统的生态规范与伦理，

并影响着村民的日常行为，最终使得村民被动地适应着改变了的环境，并在无意识中使用与开发了水体的纳污功能，由此从传统的保护者变为现代的污染者。^[21]陈涛则以一个没有现代工业的自然村落为个案，揭示了传统道德衰落、乡土规则失效、社区归属感与组织程度弱化等改变村民原有环境行为，致使非工业污染日益加重。^[22]

(二) 社会制度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强调政府主导的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制度、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对公众环境行为的影响。

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在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在取得较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不少负面后果。如公众在环境保护方面对政府产生依赖心理，自身的环境责任感和环境意识较难提升，进而影响到公众环境行为的实施；在地方政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以及政企分开尚未得到全面落实的情形下，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常常构成利益共同体，这种“政治经济一体化权力格局”使得污染持续扩散，受害者将继续受害，^[23]最终在地区生态环境危机和灾难面前，居于上层的、负有直接和间接责任的精英群体选择逃离，而绝大多数的受害者则只能被动忍耐与适应。^[24]实际上，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环境行为非孤立存在，三者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构成了整个社会环境行为的综合性的结果。^[25]故我们在理解与考察公众环境行为时，应看到社会制度对不同主体环境行为的影响以及彼此间的相互作用。

由于政策制定的不完全性、人们对政策与环境的认知差异、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互补与摩擦、组织借助中的规范多重性以及政策实施中监控问题的存在^[26]，致使环境政策的实施往往带来意料之外的后果，进而对环境政策相关者的环境行为产生影响。王晓毅则基于内蒙古草原社区的调查认为，我国环境政策往往忽视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单纯从减少人口以降低资源消耗，从而达到恢复和保护环境的目的出发，简单采取生态移民以及休牧、禁牧政策等以试图改善草原生态；加之这些环境政策经常是城市导向的，把当地居民从生态保护中剥离出来，既忽视了他们的利益诉求，也忽视传统知识的作用。最终导致地方政府的行行为变异，如生态建设沦为“跑项目”的工具，生态罚款成为“创收”的手段；以及当地居民的普遍违规，如被迫“偷牧”、“夜牧”、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利用等。^[27]

(三) 环境行为的社会基础：强调性别、年

龄、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等社会人口特征以及社会阶层、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等社会结构变量对环境行为的影响。

如前所述,大部分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调查都涉及到社会人口特征与环境意识及环境行为的相关关系,但多局限于二者关系初步描述及简单的相关关系考察,加之概念界定与变量测量不统一,故呈现出诸多互为矛盾的结果。在为数不多的着重探讨环境行为社会基础的研究中,龚文娟的研究较具代表性,她结合社会化、性别角色以及低成本理论等,基于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市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性别差异:女性的环境友好行为多于男性,且更倾向于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行为;但在公共领域内,环境友好行为并没有体现出性别差异,参与比例都很低^[28]。

另有学者尝试将心理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结合在一起,对环境行为展开研究。任莉颖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特点和居住地等社会经济基础变量与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污染后果认知、环境主义观念、环境代价意识、朴素自然观等环境意识变量以及环境知识水平两项加以结合,探讨其对公众环境保护参与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基础、环境意识与环境知识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受教育程度、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和环境知识水平相互关联,作用显著。^[29]而李文娟将个人环境保护行为区分为日常性环境保护行为和参与性环境保护行为两个层次,并基于武夷山市居民环境保护行为的调查发现:两者均具被动性特征;日常性环境保护行为只受群体他人压力变量的影响,而群体他人压力、性别、受教育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等因素则对参与性环境保护行为起作用。^[30]王凤则依据社会背景与环境意识对环保行为的交互作用机理,通过对陕西省城乡居民的环境意识调查发现:环保知识、环保重要性、受教育程度对个人环保习惯与公众环保行为有着正向的影响,年龄、收入与环境意义对二者则不起作用;环境知识、受教育程度以及性别等都是借助环保重要性这一中介变量对个人环保习惯产生影响。^[31]

整体而言,伴随着学界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及其社会影响的逐步关注,环境行为的社会性愈发鲜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社会人口特征等结构性因素对环境行为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对环境行为

的结构性因素进行直接、系统的探讨并不多见,多夹杂在对环境问题的成因分析、环境恶化的根源以及环境状况恶化的社会影响与应对等论述之中。其次,文化人类学者与社会学者往往基于个案研究,发现民间环境知识、文化传统、社区规范、价值观念变迁、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对拓展与深化环境行为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相关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涵,还需纳入相关的定量研究中加以检验。此外,对环境行为社会基础的定量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部分学者只是初步尝试将心理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予以结合,理论推导与理论解释较为薄弱,加之调查往往局限于某一地区,从而影响到研究结论的推广价值。

四、结语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国内相关成果对我们进一步深化环境行为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我国学者最初将环境行为视为环境意识的一部分,重在描述公众对环境状况的认知、环境知识水平、环境信息获取方式、对环境管理工作的评价、环境行为概况等,忽视了环境行为的背后根源及生成机制;后来逐渐将其从环境意识中剥离出来,但着重从环境态度—环境行为关系视角对环境行为进行研究,由于对环境意识、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理解与界定不统一、核心概念模糊不清与彼此交织以及具体指标多种多样,加之大多数研究对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间的关系只是基于统计意义上的发现并加以描述,缺乏理论关怀与理论解释,以及对结构性因素的忽视,使得研究本身具有较大局限,难以取得较大进展。

实际上,“希望通过环境意识研究来为环境行为研究找到捷径的想法,被实践证明是无法实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环境意识的研究,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直接对环境行为进行没有太多预设的研究上面”^[32]。故我们应超越态度研究的范畴,直接对环境行为展开研究,且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时,得对相关概念有着准确的把握,并正视其内在局限性。

其次,伴随着学界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及其社会影响的逐步关注,环境行为的社会性愈发鲜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因素对环境行为的影响,但较为缺乏直接、系统的探讨,多夹杂在文化人类学者与社会学者对环境问题的成因分析、环境恶化的根源以及环境状况恶化的社会影响与应对等论

述之中, 故还需将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操作化, 进而纳入相关的定量研究中予以检验。

虽然诸多研究对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职业、地域等社会人口特征与环境意识、环境行为的相关关系加以考察, 但多局限于二者关系初步描述。也就是说, 我国针对环境行为社会基础的定量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另外, 虽然部

分学者开始尝试将心理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予以结合, 但理论推导与理论解释较为薄弱, 加之调查多局限于某一城市或某一地区, 且在样本大小的确定、对象的选取、抽样方法等方面也存在诸多不足, 从而影响调查发现以及研究结论的推广。故应从心理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相结合的视角, 进一步推动对环境行为开展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 〔1〕洪大用. 环境社会学〔A〕. 郑杭生主编. 中国社会学 30 年 (1978-2008)〔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364-365
- 〔2〕庄国泰. 论环境意识的基本内涵〔A〕. 国家环境保护局宣传教育司编. 中国的环境宣传〔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2 杨朝飞. 环境保护与环境文化〔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中国公众环境意识初探〔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8
- 〔3〕吴报中. 提高环保工作者和有关部门高层决策者的环境意识至关重要〔A〕. 郝小林, 徐庆华主编. 中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8 7.
- 〔4〕〔5〕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1998 27, 153
- 〔6〕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教育部编. 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9
- 〔7〕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 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绿皮书 (2005)〔J〕. 绿叶, 2006 增刊.
- 〔8〕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 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绿皮书 (2007)〔J〕. 内部资料, 2008
- 〔9〕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章少民秘书长发布 2008 中国公众环保指数〔EB〕. <http://www.t65.net/zhuantizhishu/2008gongzhongzhishu/mydoc003.htm>.
- 〔10〕王民. 环境意识及测评方法研究〔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9
- 〔11〕钟毅平, 谭千保, 张英. 大学生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调查研究〔J〕. 心理科学, 2003 (3).
- 〔12〕沈立军. 大学生环境价值观、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的特点及关系研究〔D〕. 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 〔13〕孙岩. 居民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论文, 2006
- 〔14〕刘建国. 城市居民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关系研究——以兰州市为例〔D〕. 兰州大学硕士论文, 2007
- 〔15〕唐明皓, 周庆, 匡海敏. 城镇居民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调查〔J〕.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9 (1).
- 〔16〕祁秋寅, 等. 自然遗产地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倾向研究——以九寨沟为例〔J〕. 旅游学刊, 2009 (11).
- 〔17〕麻国庆. 环境研究的社会文化观〔J〕. 社会学研究, 1993 (5).
- 〔18〕马戎. 必须重视环境社会学——谈社会学在环境科学中的作用〔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4).
- 〔19〕景军. 认知与自觉: 一个西北乡村的环境抗争〔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09 (4).
- 〔20〕陈阿江. 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 东村个案研究〔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0 (1).
- 〔21〕陈阿江. 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 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J〕. 学海, 2007 (1).
- 〔22〕陈涛. 非工业污染的环境社会学阐释——以淮河流域徐村个案研究〔J〕. 天府新论, 2008 (5).
- 〔23〕张玉林, 顾金土. 环境污染背景下的“三农问题”〔J〕. 战略与管理, 2003 (3).
- 〔24〕张玉林. 另一种不平等: 环境战争与“灾难”分配〔J〕. 绿叶, 2009 (4).
- 〔25〕王芳. 理性的困境: 转型期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探析——环境行为的一种视角〔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2007 (1).
- 〔26〕林梅. 环境政策实施机制研究——一个制度分析框架〔J〕. 社会学研究, 2003 (1).
- 〔27〕王晓毅. 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内蒙古六个嘎查村的调查〔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28〕龚文娟. 中国城市居民环境友好行为之性别差异分析〔J〕. 妇女研究论丛, 2008 (6).
- 〔29〕任莉颖. 环境保护中的公共参与〔A〕. 杨明主编. 环境问题与环境意识〔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 〔30〕李文娟. 影响个人环境保护行为的多因素分析——来自武夷山市的调查研究〔D〕. 厦门大学硕士论文, 2006
- 〔31〕王凤. 公众参与环保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 (6).
- 〔32〕周志家. 环境意识研究: 现状、困境与出路〔J〕. 厦门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08 (4).

(责任编辑: 何 频)